

CS 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 卡卓语研究

木仕华 / 著

民族出版社

# 卡卓语研究

木仕华 著

民族出版社

主编：孙宏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卓语研究 / 木仕华著 .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1

(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

ISBN 7-105-05290-2

I . 卡… II . 木… III . 蒙古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卡卓语—研究 IV . H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61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76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36.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编辑室电话：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敏 黄行 照那斯图

戴庆厦

##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 年 - 1987 年正式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

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 年 1 月

# 目 录

序 .....	( 1 )
<b>第一章 绪论 .....</b>	<b>( 1 )</b>
第一节 人文概况 .....	( 1 )
第二节 历史源流 .....	( 2 )
第三节 社会文化 .....	( 8 )
第四节 研究概况 .....	(22)
<b>第二章 语音 .....</b>	<b>(30)</b>
第一节 卡卓语的语音系统 .....	(30)
第二节 汉语借词的语音 .....	(34)
<b>第三章 词汇 .....</b>	<b>(47)</b>
第一节 卡卓语词汇概貌 .....	(47)
第二节 词的构成 .....	(51)
第三节 汉语借词的构词方式 及其对卡卓语的影响 .....	(56)
第四节 卡卓语文化特色词 与兴蒙古族文化 .....	(64)
<b>第四章 语法 .....</b>	<b>(78)</b>
第一节 词类 .....	(78)
第二节 词的组合 .....	(102)

第三节	句法.....	(111)
第四节	汉语对卡卓语语法的影响.....	(124)
<b>第五章</b>	<b>卡卓语的系属问题.....</b>	<b>(129)</b>
第一节	卡卓语系属问题的争议.....	(129)
第二节	卡卓语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对比.....	(135)
第三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诸语言的比较.....	(142)
第四节	卡卓语与藏缅语族主要语支的同源词.....	(156)
第五节	卡卓语与白语、土家语的比较.....	(164)
第六节	卡卓语声母与彝语支语言清浊声母比较.....	(175)
第七节	卡卓语元音与彝语支语言松紧元音的比较.....	(181)
第八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数词音变现象比较.....	(184)
第九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声调对应情况比较.....	(186)
第十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语序类型比较.....	(189)
第十一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结构助词比较.....	(203)
第十二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动词重叠比较.....	(208)
第十三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动词使动范畴比较.....	(213)
第十四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疑问代词重叠形式比较.....	(217)

第十五节	卡卓语与彝语支语言	
	句尾助词比较	(220)
第十六节	卡卓语的系属归向	(237)
第六章 “语言底层”与卡卓语的形成		(255)
第一节	卡卓语形成的历史背景	(255)
第二节	“白语底层”说辨析	(266)
第三节	“北方蒙古语底层”说辨析	(282)
第四节	“混合语”说辨析	(287)
附录:		(291)
一、词汇		(291)
二、长篇语料		(329)
主要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44)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人文概况

### 一、称谓、人口、建置沿革

卡卓语是居住在云南省玉溪地区通海县兴蒙蒙古族自治乡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兴蒙乡蒙古族自称“卡卓”(kha<sup>55</sup> tso<sup>31</sup>)、“嘎卓”(ka<sup>55</sup> tso<sup>31</sup>)，也自称“蒙古”、“蒙古勒”，因绝大多数兴蒙乡蒙古族自称“卡卓”，因此我们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称为“卡卓语”(kha<sup>55</sup> tso<sup>31</sup> təhi<sup>31</sup>)<sup>①</sup>。兴蒙蒙古族乡位于杞麓湖西，距通海县城秀山镇约15公里，兴蒙乡东与九街乡的大河嘴村相连，与河西镇（原河西县县城）、回村、戴文、解家营、石山嘴相毗邻。兴蒙乡下属5个自然村，均位于凤凰山麓。由西而东依次分别为中村、白阁（有时写为“北郭”、“北阁”）、下村、交椅湾、桃家嘴（陶家嘴）。

兴蒙乡共有人口5479人其中蒙古族5339人，占97.44%（1998年调查）另有汉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回族、傣族共140人占2.56%。附近汉族称蒙古族为“渔夫”，这与历史上兴蒙乡蒙古族以渔业为生计方式相关。故元朝以后的地方文献大

<sup>①</sup> 关于兴蒙蒙古族自称的读音，绝大多数人大都读为 kha<sup>55</sup> tso<sup>31</sup>，并认为读 ka<sup>55</sup> tso<sup>31</sup>也可以，此时无语义差别。少数人，尤其是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读 ka<sup>55</sup> tso<sup>31</sup>，用汉语译写为“卡卓”、“嘎卓”、“刚卓”，均为同一语词的不同译写法。

都用“渔夫”或“渔户”指称兴蒙乡蒙古族。1949年前兴蒙蒙古族乡的5个自然村属于原河西县的仙岩乡（该乡尚有属于汉族的解家营、湾石头、甸高、上村等村）。1951年，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成立“新蒙蒙古族自治乡”，归属原河西县第二区。1958年易名为河西县西城公社下渔管理区。1962年改称凤山公社，辖解家营、下渔、石山嘴三个生产大队。1964年凤山公社并入西城公社，蒙古族聚居的5个自然村仍称下渔大队。1980年改称新蒙大队。1984年恢复旧称“新蒙蒙古族乡”，归属通海县河西区。1987年12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通海县兴蒙蒙古族自治乡”，直属通海县。

## 第二节 历史源流

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成吉思汗孙蒙哥汗令其弟忽必烈统率10万大军征大理。1253年即南宋宝祐元年，忽必烈率蒙古铁骑自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兵分三路：西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途经今四川松潘、理塘、稻城，云南中甸一带；东路、中路经茂州、鱼通、泸定、汉源，又在西昌另外分兵两路。东路军由抄合也只烈率领，路经德昌、会理；中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经云南四川交界区域自盐源、宁蒗跨革囊抵丽江，史称“元跨革囊”。《元世祖平云南碑》载曰：“乃宪庙践祚元二年，岁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帝新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大渡河，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明年春，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

之，士振旅而还”<sup>①</sup>。蒙古大军打破了秦汉以降，唐宋之季南诏、大理割据局面，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忽必烈班师回朝后，兀良合台在镇守云南期间，云南全境尚未完全归附，故战事频频，蒙古军队只能据守重要关隘要津，控扼各方土豪势力。“不二年，平大理五域、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后为大元帅，驻大理”<sup>②</sup>。在攻破鸭池城（今昆明）后，于宝祐三年（1255年）先后攻取了东北的不花合国、阿合阿国（今云南曲靖地区），又南下攻取了阿僰国（今玉溪地区）。从公元1254年秋天至1256年间，兀良合台继忽必烈之后，把原大理国境内的腾冲府以东；波丽国（普洱）以北的地区都征服了。而在被征服的地区，仍然利用以原大理国王段兴智为首的各民族中的贵族分子进行统治。及至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过镇大理”之后，便在云南积极从事北上夹攻南宋的活动。首先是迫使当时越南北方的陈朝投降，以为北上打开通道，并防止北上后陈朝军队截击其后。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乃出动军队进攻越南北方的陈朝。<sup>③</sup> 1258年蒙哥发动了三路进攻南宋的战争。蒙哥亲率军队自川西出师，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而驻军云南的兀良合台奉命经广西南部北上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三路军会合的地点就定在长沙。这一计划因蒙哥死于四川合州（今合川），忽必烈北上继承帝位而未实现，但兀良合台仍率蒙古“四王”的精锐骑兵，加上征发的云南各民族军队，途经广西、湖南，在静江府（今桂林）、潭州大破宋军后，一直打到鄂州（今湖北武昌）然后渡江与大军会合。<sup>④</sup> 兀良合台所率的蒙古军队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作为南部重要犄角充当

①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二。

② 王怍：《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大元光禄大夫平章兀良氏先庙碑铭》。

③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④ 杜玉亭、陈昌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页。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足可见所率兵马之强悍。在元世祖忽必烈平云南后的第 26 年即 1279 年蒙元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顺承大统。云南也因此而成为全国十个行中书省之一。自 1253 年至 1271 年蒙古首领曾在云南境内设置了 19 个万户府，各万户府之下又分设千户、百户所，而充当千户、百户长的彝族、白族贵族，则仍然利用他们原来的统治方式统治本民族的人民，听从蒙古贵族的调遣。蒙古军官则充当大元帅、都元帅以统蒙古兵驻守监督，并先后派遣蒙古王族中的人来作云南王以总其权。<sup>①</sup> 而今通海一带则设有阿僰万户府，驻今建水，下辖建水千户所（在今建水），目则千户所（在今蒙自），通海千户所（在今通海）。云南建行省后，改设县。故《元史·地理志》“河西下。县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蹻王其地。唐初于姚州云南置西宗州，领三县，河西其一也。天宝后没于蛮，为步雄部，后阿僰蛮易渠夺而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七年，即阿僰部立万户，休腊隶之。至元十三年，改为河西州，隶临安路。二十六年，降为县”。而通海县境内的曲陀关作为连接滇中高原和滇南大部的重要关隘，历代均派兵驻守。南诏时归属南诏通海都督府，大理国时改为秀山郡。元朝统一云南后，曾在各个战略要地驻扎重兵，在行省以下和路、府之上，设立兼管军政和民间事务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委派蒙古诸王驻治设防。至元十七年（1280 年）于原河西县的曲陀关设“临安、广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委任术律杰为都元帅，统辖临安（今通海、泸西）至交趾（今越南）的广大地区。术律杰当为元统一云南后的首任长官。今曲陀关邻近区域的军政长官。据云南诸路中书省郎李泰撰写的《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sup>②</sup> 载：“云南去京师万里，诸彝杂处，叛服不常，必威

①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4 页。

② 此碑现收藏于兴蒙乡下村“三圣宫”内。

之以兵则久安而长治，此至正二十有一年，经始都元帅府于曲陀阳关之原，使神人上下之分不逾，一举两得也。于戏！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旗为边将，披坚执锐，驰骋游猎，分内事业，今崇尚斯文，投戈讲道，能为人之所不能者，非有高世之志，绝伦之才，其孰能之！”可知元朝时曲陀关实属重点设防的关隘之一，且由蒙古将士驻守。成为今通海蒙古族的直接来源之一。又据《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旗墓志》<sup>①</sup>（立于清嘉庆十一年）载曰：“吾家原籍蒙古，随大元入中国，官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于至正二十年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旗奉命平滇，任宣慰司总管。因临安路诸彝叛服不常，特授元帅府都元帅，领山东江冀晋关陕番汉军一十五翼，镇曲陀关，凡四境之千户、百户及万户府皆属焉。爰以东厄（扼）交趾，西制新嶍，柔以文德，畏以武威，侏离爨僰之徒，尽革面洗心，喁喁向化，列为编氓”。“顺帝至正二年，荫任元帅府都元帅职，于曲陀建卧龙祠，武安王庙，时而横槊赋诗，时而投戈讲道，镇抚二十余年，交南无侵叛之患，新嶍泯扰攘之声。谓非公之能继述先业而克成厥志也哉。乃于讲学习射之暇，种桃千株，植松数围，以帅府桃林为景”。“恩沐圣朝光荣亿祀也。既而三世祖昆仲芬芳，长讳宣福，次讳史喇卜花、三讳哈喇卜花。”上述记载均证明元朝开国前后镇守曲陀关的蒙古将士与今通海兴蒙乡蒙古族人的源流实系一脉相承的关系。今存秀山公园，刻于元宣光七年的《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中亦有“河西县禄卑乡，临安路判官僧加奴施，地名旭浮，水田六双，东至活券，……西北至阿波苴…南至藏经地，西至完者卜花”的记载。其中的“完者不花”、“阿喇帖木耳”、“史喇卜花”、“哈喇卜花”等名称显然是蒙古语的汉字译写，是兴蒙蒙古族历史源流的明证。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

<sup>①</sup> 此碑现收藏于兴蒙乡下村“三圣宫”内。

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元顺帝率余部回归漠北。蒙古贵族在中原及其他各省的统治已告结束。元朝统治中国全境的 89 年（1279——1368）也就此中止。而远在西南一隅的云南行省自 1253 年忽必烈平云南始至公元 1381 年的 128 年间却一直处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中，仍为元朝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盘据。梁王仍岁遣使经西番（今西藏）绕出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sup>①</sup>。直到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令傅友德、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历经周折才击溃了盘踞滇省的数十万蒙古军队，云南王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逃至晋宁自杀身亡，蒙元在云南的统治才告终了。足可见有元一代，蒙古军队进驻云南的数量之巨，实力之强。因此在元朝结束后的十三年间，在无后援的条件下，依凭军事、经济雄强基础，敢于同明王朝对抗，堪称奇迹。故史家认为：“滇之开，始于战国，其文化彬炳，足与中原抗衡之两爨南诏大理，实以汉民族迁移为一大重之原动力”，“自宋太祖玉斧一挥，以大渡河为界，不遑经略南中，于是滇之文化乃忽趋于停顿现象者三百余年。元起漠北，囊括欧亚，当是时也，太弟忽必烈更率军南征大理，深入缅越，回军川陕两湖，以收拾南宋残破之山河，于是西南滇黔故地，再加入中国版图，而新兴民族之‘回回与蒙族’复风起云涌，移植云南，与滇之新旧汉族，爨僰百蛮相聚一堂，相鎔一治。”<sup>②</sup> 亦可见蒙元军队平云南，治理滇省的深远影响。

“蒙族之移滇者以仕宦为最”，此外在历次征讨中，尤其是兀良合台自大理南征东进进程也是蒙古族兵丁移殖云南的源头之一。《元史·兵志》载：“至元十一年，以忙古带新旧军一万一千人戍建都。十七年七月括蒙古军成丁者，敕亦来等率万人入罗氏

---

<sup>①</sup> 《元史·把匝刺瓦尔密传》。

<sup>②</sup>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台湾中华书局 1968 年印行，第 43 页。

鬼国，二十三年，勅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立乌蒙站，是为蒙族移植滇东金沙江内外之始。二十一年增蒙古及探马赤二千人，命药刺海领之，往戍金齿国。二十三年，枢密院奏纳速刺丁言：所统渐丁五千人，往攻打马国，其力已疲，今诸王复藉此征缅”。后人推测并依史实称：“盖至元以来用兵缅越乌蒙金齿诸役，先后凡数十万人镇以亲王贵臣，皆以蒙族为其主力。至元三十年，免云南屯田逋租至于万石，当日用兵之众，可想而知矣。”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载曰：“至元三年，尚书省臣言。云南省临安、大理等处宣慰司，……普定路所隶部曲，连结蛮寇，杀掠良民，谕之不报，方且调兵，讨八百媳妇，军力消耗，今拟蒙古军人给马一，汉军十人给马二，计值与之，乞赐钞三万锭。四军调四川蒙古汉军四千人，命囊加歹领赴云南镇守”。此外，戍守云南的蒙古贵族中，授封为王的数量不少，兀良合台即率有四个蒙古王的骑兵。忽必烈于 1257 年封其第 5 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坐镇云南之后。于 1290 年，又在云南封了一个高于云南王的“梁王”，首次封为梁王的王子为皇太子真金的长子甘麻刺<sup>①</sup>。因此，有些著作中估计，元代驻守云南的蒙古军有十余万人，有人估计有二十万人。明朝大军入滇定乱后，驻守云南各地的蒙古军队因元朝的灭亡而无力回归漠北草原，落籍云南，或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中。

元代镇守曲陀关的蒙古族军队的后裔之所以未能被周边诸多民族所同化，除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外，可以推知曲陀关作为滇中至滇南的最高军政机关，地处贯通滇中和滇南的要塞，驻守其间的将士的数目当是十分可观的。故有“至庆、延佑间，人物繁盛，市肆辐射。”<sup>②</sup> 的盛况。据清康熙《河西县志》

① 《元史·世祖本纪》。

② 《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旗墓志》（三圣宫藏碑）。

等历史文献记载，蒙古军队在通海境内的主要驻防点有曲陀关、木城山、大寨、小寨及今九街乡的“鞑靼营”（汉族称鞑子营，今为白塔营）。另外还在今寸村办事处一带设爨僰军屯，计有屯户 288 户，田地 1159 双（一双相当于四亩）。元朝中后期，蒙古族军营中有的官兵逐渐迁到河西城（当时称乡绅村）等地居住，有的下级官吏和士兵迁居凤凰山脚下（今兴蒙乡）。明初，蒙古族受到歧视和打击，除了聚居在凤凰山脚下的蒙古族外，其他散居的多改为汉族，逐渐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住在河西镇，鞑靼营、上村、沙罗村、水磨村等地又逐渐向凤凰山脚下迁居，使杞麓湖西畔的北阁等村成为了云南仅有的蒙古族聚居地。<sup>①</sup> 虽然现今云南省境内的文山州、红河州、昭通、曲靖、思茅、大理、临沧、保山等地也有蒙古族分布，但处于离散的分布格局。即使聚居成村落的地方，当地蒙古族已转用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已丧失母语，蒙古族传统文化也已被汉文化等取代。相比之下，兴蒙蒙古族在诸方面都较系统地得以保留，无论是村寨布局、历史沿革、民族历史文献、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母语传承等都较其他云南境内蒙古族完整。因此，兴蒙蒙古族拥有独具的研究价值。故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北方蒙古族人士都不断前往兴蒙访问调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兴蒙乡的知名度，引起国际蒙古学界和中国民族学家的广泛注意。各学科、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亦不断展开。

### 第三节 社会文化

自元末明初以降，通海蒙古族聚居凤凰山下，杞麓湖畔。随着生存方式的变迁，经济文化类型亦发生了转换。由原先草原游牧

<sup>①</sup> 《通海县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 102 页。